

西南联大文学书写的战争记忆^{〔*〕}

杨绍军

(云南大学 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中国作家、诗人和学者对以西南联大历史为题材的创作, 产生了许多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的文学作品, 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表现空间。在西南联大诞生以来的 80 余年间, 不同的创作者在文学作品中对战乱现实的书写, 实现了战争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建构, 并引发了良好的互动; 同时, 创作者们在作品中对战争进行了反思、对人性进行了关注, 用文学作品强化了人类对战争的记忆和书写, 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国家认同、凝聚了民族精神、构建了抗战记忆。

〔关键词〕西南联大; 文学书写; 战争记忆; 战争反思

DOI: 10. 3969/j. issn. 1002 - 1698. 2021. 07. 017

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构成了 20 世纪中国历史和集体记忆的重要内容。自“九一八”事变到抗战取得胜利, 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多有战争记忆的建构。战争记忆不仅关乎过去, 也关乎人们当下的理解与反思, 更影响着未来的想象与建构, 它以无形的状态游弋于过去与未来之间。记忆本身并不会伴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我们只是习惯于一种源于主观性的遗忘之中。这种“遗忘”只是人类自身一种习惯性的生活模式, 并不代表借此可以消弭记忆的存在性。因此, 这种基于人类自身主观思维机制的“忘记”行为恰恰是危险的, 针对这种“危险”,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说过: “我们处在忘记过去的危险中, 而且这样一种遗忘, 更别忘忘

却的内容本身, 意味着我们丧失了自身的一个向度, 一个在人类存在方面纵深的向度。因为记忆和纵深是同一的, 或者说, 除非经由记忆之路, 人不能达到纵深。”^{〔1〕}可以说, 无论是战争中个人经历的描述, 还是集体记忆呈现, 中国文学始终承担着对战争记忆的持续性建构。

抗战期间, 中国作家就以艰苦悲壮的战争为背景, 先后写出《生死场》《四世同堂》《倾城之恋》《滇缅公路》《森林之魅》等优秀的作品; 到 20 世纪 50、60 年代, 中国文坛出现《苦菜花》《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战斗的青春》等表现抗战的小说; 新时期以来, 《长城万里图》《战争和人》《黑太阳》《国殇》《历史的天空》等作品的出现, 将抗战记忆推向新的阶段。在一定程度上, 这些

作者简介: 杨绍军, 文学博士, 云南大学文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西南联大文学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研究”(16BZW128) 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文学作品对于塑造国家认同、凝聚民族精神、重塑历史记忆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在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中,战争亲历者、受害者的人生经历,或是没有经历战争的作家、诗人对战争进行的反思和感悟,都将“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经由记忆之路”,用文学强化了人类对战争的记忆和书写。

一、战乱现实的书写

对于抗日战争的记忆,郑毅认为:“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抗战记忆中浓厚的受害者意识始终是中国社会战争记忆的主体,战胜国的荣耀历史记忆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从属和边缘的地位。受害者意识与战胜国历史记忆的完整性,不仅对中国社会的战争记忆重构具有重要意义,对东亚社会而言同样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2]确实如此,由于战争记忆建构的情境和主体不同,伴随政治情势的变化、发展,不同的时代也就有不同的战争记忆。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东北,中华民族奋起抵抗,开始了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这一时期的战争记忆以国民政府为主导者、推动者,民间社会也积极响应,为广泛动员民族抗战、捍卫民族尊严、赢得国家独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对战争记忆和受害者意识进行清理,就被卷入朝鲜战争,直到“文革”结束以后,对抗战的记忆才逐渐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不仅有官方的记忆、民间的记忆,还有个人的记忆,此三者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这一时期的战争记忆为探明历史真相、固化战争情节、促进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王成在探讨日本作家目取真俊的创作时提出这样一个疑问:“战争的记忆也会随着白骨的风化而消失吗?”^[3]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这些惨痛的记忆会隐藏于我们无法规避的地带,结构我们的主体性。这样记忆的存在也促使着作家、诗人主动进行文学的创作,借此来沉淀、固化战

争,从而对战争的历史和记忆进行还原。因此,在对西南联大进行书写的过程中,几乎到处可以看到中国作家、诗人对战乱现实的描绘和书写。

在某种意义上,记忆的真正主体是个人,也就是说,战争记忆建构的主体也是个体,而战争记忆不会凭空存在,需要以一定的形式或载体保存下来,在这个过程中,个体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法国著名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说过:“记忆既是集体的、多元的,又是个体化的。”^[4]正是依赖于个体的人,将战争期间所经历的人和事记录下来,分享了对战争的独特体验和感受,才强化了后人对未经史实的经验与续写。个体作为群体成员参与到各种形式的活动之中,诸如文学创作。不同的作家进行“及时性”和“在场”的书写,或是将过去熟悉的时空场景、具体的人事活动描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集体记忆的同质化、刻板化,让个体记忆以鲜活生动的形式得以存续和承传。在对抗战的记忆建构中,作为经历者的个体,因遭遇与观感不同,也就形成不同的战争记忆,由此产生了个性各异的抗日回忆录、抗战诗歌和散文。这些作品里也许有相同或者相似的经历、观感,但它们以文学的形式将集体记忆得以固化和传承。由此不难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个体记忆既受制于又不等同于集体记忆和公共记忆……惟其有不同的理解和感知、不同的情感和意义,才能在集体与社会的框架中继续保持记忆的质感、多样性、鲜活性,才使记忆不至于变成僵化、刻板、抽象的符号。”^[5]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或时空场景,抗战时期的亲历者、受害者在作品里,将战争记忆以文本形式留存。如赵瑞蕙在《当敌机空袭的时候》写他和杨苡一起“跑警报”:

我俩走走跑跑,出了城门后,就听见第二次警报响了,赶快奔到离城较远的一条大堤上,旁边正好有一个土沟,三四尺深,敌机来时,可跳下躲躲。接着,城楼上挂起了三个灯笼,紧急警报猛然强烈地拉响了。我们跳进长满杂草的沟里,静静地望着……我们看见

敌机俯冲下来,投弹了,数不清的炸弹往下掉,发出魔鬼似的凄厉的声音,大约落在东城一带,那里一阵阵巨响,尘土黑烟高扬,火光冲天……。^[6]

抗日战争作为日本法西斯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侵略者先占领中国东北,再制造事端,占领华北,不断屠杀平民、毁坏家园、掠夺财富,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等惨绝人寰的历史灾难,使中华民族遭受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抗日战争的历史,既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历史,也是中国人民的抗争历史,正如研究者所说,“抗日战争的目标乃追寻和平,抗战记忆表面而言是关于战争的记忆,其实质是关于和平的记忆,战争与和平本即共存。”^[7]中华民族为走向民族独立、追求和平,在抗战中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也留下丰富的战争记忆。对于如何呈现这段历史灾难和战争记忆,兴起于1980年的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预设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8]也就是说,人们需要以文字作为载体形成文本,才能触摸过去、认识历史,也才能重构真实的战争历史和战争记忆。在战争记忆中,显然有了亲历者的记忆和叙述,才有一定形式的个体记忆。作为战争的亲历者,赵瑞蕪回忆了昆明跑警报的经历,对日本飞机空袭昆明进行了叙述,以“发出魔鬼似的凄厉的声音”展示侵略者的狂轰滥炸,以及对生命的肆意践踏。可以说,作品真实地记录了战争时期“跑警报”的原始场景,对昆明被轰炸的历史进行了文本建构,以文本为媒介呈现了过去发生的事情,重构了抗战时期昆明的生活和战争记忆,而这种对记忆的建构是由个体或者亲历者完成的。

对于抗战记忆的来源,有直接或间接的分别。直接的记忆来源于亲历者的回忆和书写,间接的记忆则来源于历史书写或是创作者的主观建构。无论是直接的记忆或是间接的记忆,都需要以一定的文本作为媒介出现。在以西南联大为主题的书写中,作为亲历者的回忆,除赵瑞蕪

的《离乱弦歌忆旧游》外,还有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蒋梦麟《西潮》、冯至《昆明往事》、浦江清《西行日记》、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李广田《西行记》等,他们都对抗战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人生际遇进行了记录和回忆,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复活历史”或者重构战争记忆。对此,郭辉说:“中国抗日战争留下了相当宝贵的历史记忆,当然不仅是屈辱的记忆,更多的属于中华民族奋起抗争的记忆。并且随着时代变化,抗日战争记忆被不断发掘,并被赋予越发丰富的意义,记忆随现实场景需要而激活并呈现。”^[9]

新世纪以来,诗人海男不断地调动文学想象来呈现个体的战争记忆,对西南联大的历史进行复述,也对联大师生在炮火中的南渡、在风雨飘摇中的探索、在警报声中的成长进行呼应。对这些与战争相关的内容进行了想象书写,也写出了主观建构的战争记忆。如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对敌:

他们也许就是相互的敌人。这些遭遇使两个国家的将士

在河的北岸相遇,他们用刺刀机遇,用猩红奔溅的热血相遇

用捍卫和践踏来相遇。几十次的遭遇战争中倒下去了又一批人

彪关河战役使中国远征军挫败了日军的骄气,有500多日军

倒了下去。这次战役捕获到了日军的军用地图,这摊开的

地图上的侵略符号,仿佛想一口气吞噬热气腾腾的美食

这就是战争的潜符号。只有在这个云南的初秋,我领略了战争^[10]

战争记忆经过抗战时期作家的阐释和表达,再经过战后不同时代作家的想象建构,其历史内涵和形式意味也越来越丰富,这对于促进国家认同、塑造民族形象、推动和平友好等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远古至今,战争还催生了数量多得令人无法想象的诗歌。无论是高雅的、粗俗

的,还是雅俗共赏的。”^[11]

抗战时期的诗歌,不外乎三类:一是鼓励和号召人们参战的,如卞之琳《地方武装的新战士》和田间《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等;二是庆祝战争胜利的,如穆旦《给战士——欧战胜利日》等;三是哀叹战争的痛苦和悲壮的,如杜运燮《林中鬼夜哭》和罗寄一《在中国的冬夜里》等。在这些作品里,中国现代主义诗人与古今中外的诗人一样,对战争的纷争、痛苦、死亡、悲伤、欢呼、哀怨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形成了创伤记忆或者复兴记忆。在海男的《穿越西南联大挽歌》中,她从个体记忆的视角出发,对战争中的苦难和体验进行了重构,再现了中国远征军在异域的殊死搏斗和惨烈牺牲的场面。同时,她试图重新进入历史,对诸如黄仁宇《缅北之战》和穆旦《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都没有提到的“彪关河战役”^[12]进行了书写,并对“彪关河战役”的战斗情形、历史意义进行了呈现与反思。可以说,海男将文学与历史再度融合起来,再现了战争的记忆,从而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记录了“彪关河战役”,阐明了此次战役的过程和内容,实现了文学对历史事件的再现,也重构了中国远征军的征战史和战争记忆。

除了以上着重强调的个人记忆,战争记忆也会在作品中以集体记忆的形式被呈现。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指出:“一个群体通过各种仪式塑造的共同记忆,不仅是每一个群体成员的私人记忆相加的产物,更是属于这个群体自身的。”^[13]在他看来,集体记忆不是群体成员“集合起来的记忆”,而是个人和群体的“集体的记忆”。实际上,抗日战争作为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和集体记忆,不同时代的作家、诗人通过不同的方式和途径来进行呈现,这将个人或群体成员的记忆聚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塑造集体记忆。

当然,记忆不是对过去的刻意恢复,而是对过去历史的建构。在这种建构中,不同的作家、诗人对抗日战争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多

维度、多层面的阐释和呈现,最终形成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对于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在抗战胜利后的生活中不断去书写、反思和重构抗日战争,不仅仅在于建构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还在于重构人类的历史记忆。因此,他们写作的目的,是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中华民族有自己的记忆。只有人们从个体的记忆中找到集体的记忆或者群体责任时,才能避免类似抗日战争的悲剧或灾难。1994年,何兆武在回忆西南联大的师友时,谈到了自己的职业选择和毕生志业:

由幼年到青年时期,正值从“九一八”“一二·八”“七七”事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火连天的岁月,人类的命运、历史的前途等问题深深吸引了自己,所以终于选择了历史作为专业。不久又对理论感到兴趣,觉得凡是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就不能称为学问;于是可走的路似乎就只有两条,一是理论的历史,二是历史的理论。^[14]

在一定程度上,集体记忆是以个体化的方式存在的,也就是说,通过个体的表述或者记忆传达,不断重构或者建构集体记忆。同时,“集体记忆是极为重要的,只有成为一种共识性的集体记忆,人类才能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但集体记忆也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而不是一种既定不变的存在。”^[15]因此,集体记忆的建构或者重构,需要在一定范围内的时空里得到群体的认同和支持。抗日战争的记忆,最初更多是国耻记忆或者说创伤记忆,日本侵略者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是民族性的,这种集体记忆不仅存在于抗日战争时期,在战后依然被不断建构和重构;与国耻记忆相伴的是抗争记忆,中华民族在战争中奋起、团结、抗争,战胜了日本侵略者的杀戮和压迫,书写了中华民族的抗争历史;抗日战争的胜利铸就了荣耀记忆或者说复兴记忆,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保存了作为战胜国的荣耀记忆。可以说,这些集体记忆应该成为抗日战争完整的历史记忆。抗战时期正是生

逢乱世、国破家亡之时,作为战争亲历者的何兆武,无法像和平时期的知识青年一样,对自己的专业、兴趣和毕生事业作自由或者任意选择,而是着重考虑“人类的命运、历史的前途”等重大现实问题,最终选择了从事“理论的历史与历史的理论”研究。在他的身上,鲜明地体现了动荡时代知识青年的抉择,不同的个体面对具体的历史情境和时局变化,作出了专业或职业的选择。这种选择不一定主要是受到战乱的影响,但是肯定与战乱的时局有关,也与抗战时期的集体记忆有关。因此,作为个体的记忆书写,何兆武的战争记忆成为重塑集体记忆的个体化书写,承载着1990年代中华民族对集体记忆的理解和阐释,在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成为抵抗集体遗忘的重要作品。

面对沉重的抗战集体记忆,作为个体的战争记忆建构者,作家、诗人如何将个体记忆聚合成为“共识性的集体记忆”,这是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在文学作品里,如果仅仅将抗日战争视为纪念性的事件,显然消弭了其应有的历史意义。如果将抗日战争视为荣耀性的记忆,过度强调对英雄人物或战争胜利的赞颂,只会徒增民族之间的敌视和仇恨。在这样的意义上,不同的作家、诗人都需要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个体既能作为群体成员参加各种仪式性活动,使集体记忆得以生成和维系;又会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形成更为具象、更富质感的个体记忆。”^[16]也就是说,战争记忆的产生和建构应该以个体记忆为基础,又必然受制于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个体记忆。因此,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并非绝然的二分关系,而是始终处在良好的互动之中。作为战争的亲历者,如何将个人记忆与集体记忆聚合在一起,或者说如何在文学作品里呈现共时性的历史记忆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的解决,宗璞在谈到《野葫芦引》的创作时说:“我并不研究历史,我和历史一起长大,虽然懵懂,也知道些边边角角,对弄清事实也许会有点帮助。这是我的责任,这不是个

人的事情,是对历史负责。”^[17]对于抗战的历史呈现或者历史言说,无论在抗战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来,都是中国作家、诗人关注的重要内容。在对战争记忆的建构中,作为创作主体尊重客观化的历史事实,同时在作为载体的作品里呈现主体的理解、认知和叙事立场,因此,他们的写作与极端个人化的历史言说是有区别的,^[18]例如宗璞开始创作于1980年代的《野葫芦引》,以《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为题,本身就彰显了20世纪30、40年代的“共识性的集体记忆”,对抗战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离乱迁徙以及中国远征军的英勇抗战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再现了抗战时期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野葫芦引》无论是规模的宏大磅礴、内涵的丰富完整,还是深刻的思想意识、崇高的艺术风格,都具有史诗性的品格。对宗璞来说,从《南渡记》发表的1987年到《北归记》发表的2017年,“似乎是作者与读者默默许下了一个30年的约定,终于,我们等到了这部巨著的最终篇章。可以说,我们见证了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奇迹的诞生,这是一部与作家的生命血肉相连、同时成长的小说,其内容更是对这个古老民族抵御外辱、自强不息的历史记述。”^[19]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的创作与自身的成长是相辅相成的,正是通过个人书写与持续的自我更新,她完成了对抗战记忆的史诗性建构,使得《野葫芦引》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创作奇迹和经典著作。

二、战争历史的反思

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也就没有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的西迁,更没有西南联大的存在。对此,易社强(John Israel)说过:“联大历时九年(1937—1946),与第二次中日战争(1937—1945)——在中国被称为‘抗日战争’——基本重合。”^[20]在8年多的时间里,西南联大师生经历了大规模的南渡,饱受战争威胁和敌机轰炸,忍受着战争灾难和生命苦痛。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与全国人民一起,投入到民

族独立与解放的事业中,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贡献了全部的力量。当时,西南联大虽然地处抗战大后方,但是西南联大的命运是与抗日战争紧密相连的。这场战争对西南联大和中国高等教育乃至中国社会发展都有深远的影响。因此,在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中,不同的作家、诗人和学者写到了战争、战争记忆,也写到了历史、战时人物。在这些作品中,创作者没有刻意渲染战争的屈辱和痛苦的记忆,而是关注和关心人类的命运,对战争期间的生命意识和人性意识进行了互文性表达,引发了理性的审视和反思,诚如王富仁所说的,“真正具有人类意识和终极关怀的作家,对于这些矛盾和仇怨,不应当使其继续积累、增加和传递下去,而应当以一个作家的良知和责任感,在战争文学创作中努力增加民族与民族间的相互理解与同情,努力弥合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沟壑和创伤。”^[21]不同的作家、诗人和学者在对西南联大的想象建构中,在作品里对战争进行了反思,也对人性进行了认知,引导人类走向和平与和解。

首先,西南联大的文字书写表现了对战争的反思。在某种意义上,战争是人类自身的灾难,无论对于战胜者还是失败者来说,战争遗留的都是灾难和痛苦记忆。在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失败的日本,对于战争没有正确的认知,也没有正确的历史观,习惯以受害者自居,殊不知侵略者才是真正的加害者。日本对亚洲各国人民施以蹂躏和迫害,对亚洲各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战争文学离不开战争,但战争文学不能仅仅是对战争历史的摹写,它更应当是作家从战争整体的反思,而不是对战争中任何一方或是某个历史事件的是与非的反思。”^[22]在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中,很多作品都写到了战争,如宗璞的《野葫芦引》、王蓝的《长夜》、海男的《梦书:西南联大》、董易的《流星群》等小说和杜远燮的《滇缅之路》、穆旦的《防空洞里的抒情诗》《森林之魅》、叶华的《迎敌》等。他们写到了具体的战事,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的奋起抵抗进行了歌

颂,对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并对战争的苦难或民族精神进行了思考,如在穆旦的《赞美》中,他对民族精神进行深刻反思,认为中华民族背负“耻辱的历史”“无言的痛苦”,希望人们知耻后勇、奋发振作。很多作品反思意味极为浓郁,在《给战士》里,穆旦写道:

有了自己的笑,有了志愿的死,
多么久了我们只是在梦想,
如今一切终于在我们手中,

有这么一天,不必再乞求,
为爱情生活,大家都放心,
大家的血里复旋起古代的英灵,

这是真正的力,为我们取得,
不可屈辱的,如今得到证明,
在坦途前进,每一步都是欢欣。^[23]

穆旦以战争为题材的诗歌在他的创作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这一方面与他的战争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与他对战争的独特思考和体验有关。穆旦《抗战诗录》里面的诗歌与当时流行的抗战诗歌明显不同,其他诗歌主要着重歌颂抗战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谴责侵略者的暴行或者抒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抗战诗录》里,穆旦不再执着于对战争是正义或者非正义的表达,而是侧重于对战争本身的深刻反思。

1945年5月9日,他创作完成了《给战士——欧战胜利日》,这首诗对欧洲战场的胜利进行了再呈现,但是他并没有停留在战争的层面进行描绘,而是对战争进行深刻反思:战争的胜利,让人们“不必做牛,做马”,在无尽的牺牲和死亡后,赢得了自由和新生。正是因为经历“野人山撤退”,对战争有着“惧怕”和抵抗的诗人,在民族战争即将胜利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对战争的胜利有着深切的思考。

作为民族灾难和历史悲剧,抗日战争在中国人民内心深处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和无法忘却的记忆。如何对待这段惨痛的战争历史,是延

续民族仇恨还是汲取经验教训,对于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当代作家、诗人来说,这是首要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抗日战争的记忆不仅仅是中华民族的灾难记忆,更应该是中日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共同的历史记忆,“直面历史,寻找真实历史记忆的目的,不是为了铭记仇恨,是为了坚守今天和未来的和平,重视历史记忆研究的目的和现实意义也就在于此。”^[24]因此,在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中,一些作家、诗人不再为描写战争而书写战争,而是通过对战争期间的具体描绘或者以战争作为现实背景,书写中华民族的时代命运和抵抗精神,同时也对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进行反思。如任继愈在回忆西南联大的人与事时,在感念旧情的同时,对中国文化、教育进行了思考:

当时我们是在闻一多先生的率领下,步行从长沙迁往昆明的,行程1300多公里。沿途我看到底层的老百姓在那么贫困、艰苦的条件下还在默默无闻地支持抗战,我就觉得这是中华民族的力量所在、精神所在、希望所在。我就决定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要以此作为终生的事业。^[25]

对于中国人来说,抗战的记忆是不会被遗忘的,因为战后不同时期的记忆正以不同的形式被重新续写:由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或者说由创伤记忆到复兴记忆,在多元化呈现的过程中,中国人民对此早已形成了较为一致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让人们不仅认识到了战争的残酷和罪恶,也让人们认识到和平的美好和幸福。相对于集体的中国人,个体“作为这个记忆共同体的成员,每个人都有保存记忆的责任,这不是要求每个人都记住全部,但是为了保存记忆的生机,个体必须承担最低限度的记忆责任”,^[26]也就是说,在对抗战记忆的建构中,个体在抗拒遗忘和建构记忆中都负有道德责任。作为抗日战争亲历者、见证者,任继愈在回忆西南联大的人和事时,对南渡时期湘黔滇旅行团徒步从长沙到昆明的艰苦生活进行了描写。他的记忆不是刻意复制战争时期的迁徙之苦,而是通过他的特殊体验

和观感,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教育进行总结与反思。他认为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根本,在于中华民族有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文化。战争时期的苦难经历经过经年的思考和岁月积淀,产生了勾连过去与未来的思考,这些思考通过回忆或者文字的形式表达出来,不单有战争的反思,还有对文化和教育的反思,从而让中华民族能更好地认识自我、把握自我、创造自我。

其次,西南联大的文字书写体现了对人性的关注。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战争成为了不同时代的主题,“从军阀混战到北伐战争,从抗日战争到国内战争,加上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27]绵延不绝的战争,让20世纪的中国人民饱受摧残。在持续的战争年代,中国的文学家没有贡献出伟大的战争文学作品。相同时期,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中,却诞生了如《静静的顿河》《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世界名著。在这些苏联的作品中,作家对战争环境的描写、人物命运的变化和丰富人性的展示,让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不断深化,对生命意识和人类命运的感知更细腻。在西方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永别了,武器》《西线无战事》《铁皮鼓》等杰出作品。这些作品以人为本,对人性、生存意义以及生命意识都进行了思考,这使它们成为20世纪战争文学的巨著。

对比国外反映战争的文学作品,反观中国的战争文学,由于作家注重对英雄人物或者说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在文学作品中忽视了普通人物的命运和作用的描写,因此对生命意识和人性关注不够充分。在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中,宗璞的《西征记》对战争的集中呈现和展示,成为《野葫芦引》长篇系列里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正如王春林评论时说的,“既然是一部带有全景意味的表现中国人民抗战精神的长篇小说,那么,宗璞的艺术着眼点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作为知识分子存在的主人公玮和崑的身上,这就是说,在把具体的艺术聚焦点集中到玮和崑身上的同时,作家

还应该较为充分地展开对社会各阶层参与抗战状况的艺术性描写。”^[28]确实,在《西征记》里,除了对玮和崑的成长经历和形象塑造进行着力外,更为重要的是,宗璞对一些普通民众或者说芸芸众生进行了描绘,如福留、苦留和阿露等普通人物,也被纳入到艺术形象的创造中,令人印象深刻。如作品里写到福留时,作家以对话的方式让福留自述:

福留说:“我爬过很深的山涧,几次掉进涧里又爬出来;又钻过几个山洞,其中一个特别长,几乎钻不出来。可是我没有死,我经过枪弹的包围,踩着地雷,可它没有炸,又爬过山涧,钻过山洞,找到了那洞口。”

“听着,福留,你做了很了不起的事。”玮说,“人们会记住你。”^[29]

一般来说,在世界战争史上,决定双方胜负的是领袖人物或者军事首领,他们成为战事的关键因素,而那些在战争中献出宝贵生命或者身负重伤的普通士兵是无足轻重的。在众多的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中,占据显要位置的同样是英雄人物,英雄人物和著名军事将领是战争的决定者或者推动者。因此,在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笔下,普通士兵和平民百姓是不重要的或者说次要的,他们没有成为表现的主要对象。但是,在宗璞的《西征记》里,他不仅对主人公玮和崑有相当出色的描绘,而且将福留、苦留等普通民众塑造得极为出色,将这些普通人的人性之善、人性之美,表达出来。作品里的福留作为滇西山区的普通民众,父母被日本人强迫修工事,修好工事后被日本人处决,他成为孤儿。在中国远征军滇西大反攻中,他无家可归,和军队在一起,在攻打高黎贡山敌人的碉堡时英勇牺牲。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诸如福留这样的普通民众的无畏牺牲,才有了滇西大反攻的惨胜,也才有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些普通民众的身上,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和品格,他们不畏牺牲、顽强抵抗,为国家和民族竭尽全力,他们也应该是英雄,也值得称颂。关于宗璞对普通人物形象的塑

造,评论者认为,“作家的艺术关注视野既投射到了如同严亮祖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军官身上,也投射到了如同瓷里土司、马福土司这样的地方土司身上,更投射到了如同福留、苦留,如同阿露、老战这样的普通民众身上”,^[30]表达了对普通民众和个体生命的重视,也表现了对人性的关注。

实际上,无论在什么时代和什么地方,战争都是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在中外文学史上,有些作家在主观上憎恶战争,有些作家则善于描写战争。但是,战争的恐怖会使许多人经历过则幡然醒悟,在他们的心灵中留下终生的创伤;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作家,也能从战争对社会的严重摧残中感知。在某种意义上,“战争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是人与人的相互残杀,是反人性的,是人类社会的怪物。”^[31]因此,对战争的思考,也就是对人类和人性的思考;对战争的描绘,也就是对人类和人性的描绘。在抗日战争中,作为抵抗者的中华民族,为什么同仇敌忾、戮力杀敌?为什么“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地顽强抵抗?这就需要作家去揭示中华民族的人性之光、人性之善。而作家的使命,就像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说的,“人类之所以永生,不仅仅因为他是各种动物中惟一能够永不疲倦地说话,而是因为他有思想,有一种怜悯人、做出牺牲、忍耐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责任就是要去描写这些东西。”^[32]在西南联大的文学书写中,无论是杜运燮在《滇缅公路》中对滇西各族人民修筑公路的歌颂,还是陈达在《浪迹十年》中对长沙人力车夫的担忧,都体现了作家的人文关怀和悲悯之心。2017年,海男在《梦书:西南联大》里写到主人公苏修和马锅头任小二在缅甸曼德勒的初次相遇,但是让苏修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再次相遇:

这是我未曾意料到的一场相遇,在缅北的一座被群山包围的小镇上,我们幸运地遇到了来自中国云南高黎贡山脚下的马锅头任小二,很快就得到了他的支持,就这样,我们从他的马队中挑选了两匹高大的骏马……任

小二笑了,随后又严肃认真地说道:“妹子,我们都是中国人,日本人就要打到我们的故乡了,这两匹马就作为是我捐献给中国远征军的交通工具,遇到危难时,就请它们为你们服务吧。”^[33]

战争是人类毁灭性的灾难,是人类活动中最残酷、最悲壮的行为。真正有良知、有担当的作家和诗人,应该自觉关心、关注人类和人性,并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这才是作家、诗人的天职和使命。在这样的意义上,海男对战争的认识或者说人性的关注,立足于对战争中人性的开掘与表现就尤为重要。海男《梦书:西南联大》里的马锅头任小二,看似与苏修毫不经意的相遇,却使他进入作品的叙述之中。任小二对中国远征军的“捐献”,充分体现了他身上的品质以及人性的美好与崇高。海男对马锅头任小二的描绘,发掘出普通人的人性之善,尽显了作家对人性的关注和重视,补充了这一时期中国文学创作的短板,为后续创作者提供了参考。

注释:

- [1][美]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89页。
- [2][24]郑毅:《中韩日“战争记忆”的差异与历史认识建构》,《日本学刊》2016年第3期。
- [3]王成:《战争的记忆与叙述》,《读书》2005年第3期。
- [4][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页。
- [5][16]李里峰:《个体记忆何以可能:建构论之反思》,《江海学刊》2012年第4期。
- [6]赵瑞蕻:《离乱弦歌忆旧游》,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 [7][9]郭辉:《抗战记忆的建构及其价值》,《兰州学刊》2020年第2期。
- [8][美]弗雷德里克·詹姆斯:《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70页。
- [10]海男:《穿越西南联大挽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65页。
- [11][以]马丁·范克勒韦尔德:《战争的文化》,李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98页。

[12]1942年3月,日军第55师团从仰光北上,向东吁不断突进,中国远征军第5军200师主力为掩护英缅军队北撤,在彪关河大桥北端设伏,待日军过了大桥后,远征军官兵将大桥炸毁。日军遭到中国军队的猛烈攻击,大部被歼,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此次战役被称为“彪关河战役”。

[13][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页。

[14]何兆武:《联大师生杂记》,《思想的苇草:历史与人生的叩问》,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页。

[15]洪治纲:《集体记忆的重构与现代性的反思——以〈南京大屠杀〉〈金陵十三钗〉和〈南京安魂曲〉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

[17]李扬:《宗璞希望写的历史向真实靠近》,《文汇报》2011年8月9日。

[18]如莫言的《红高粱》,作品讲述的是抗日战争的故事,但是由于作者站在民间立场上对民间世界进行书写,“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这部小说讲述的其实并非是历史战争,而是作家在民间话语空间里的某种寄托”,“愈加显现出低俗趣味的性质,一旦失去真正的民间理想的支撑,这类描写就很自然地堕为作者感官刺激上的自我放纵”。具体参见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18-319页。

[19]刘汀:《宗璞长篇小说〈北归记〉:古老民族的青春叙事》,《文艺报》2017年11月27日。

[20][美]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饶佳荣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3页。

[21][22][27]王富仁:《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

[23]穆旦:《穆旦诗文集·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27页。

[25]任继愈:《自由与包容:西南联大人和事》,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27页。

[26]王楠:《叙述的伦理——如何叙述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江海学刊》2018年第6期。

[28][30]王春林:《一部感人肺腑、荡气回肠的精神史诗——评宗璞长篇小说〈西征记〉》,《扬子江评论》2010年第1期。

[29]宗璞:《西征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127-128页。

[31]黄修己:《对“战争文学”的反思》,《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

[32][美]威廉·福克纳:《威廉·福克纳诺贝尔奖获奖演说》,顾飞荣、曹新宇、施桂珍编著:《诺贝尔奖获奖者演说名篇》,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第67页。

[33]海男:《梦书:西南联大》,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7年,第204-205页。

[责任编辑:陶婷婷]